

夏中义集

九
錫
先
哲
書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罔不經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
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
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衆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
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語皆非大
詞人不能道然遠以此意解諸詞恐為妄說諸公所不許也

夏中義集



清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九谒先哲书/夏中义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 2017

(夏中义集; 第3卷)

ISBN 978-7-5520-1952-0

I. ①九… II. ①夏… III. ①现代哲学—研究—中国
IV. ①B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1459 号

夏中义集(第三卷) 九谒先哲书

著 者: 夏中义

责任编辑: 缪宏才

封面设计: 莫 娇

题 签: 舒传曦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2

字 数: 28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952-0/B·219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三卷说明

本卷收《九谒先哲书》。

清华园，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文学的圣地，曾几何时，它荒芜了。故当此书依次函谒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胡适、吴晗、闻一多、冯友兰、王瑶等有涉清华背景的三代巨子，这无异于“盗墓暨招魂”——即在发掘百年先哲埋于其间的睿智、傲骨、苦泪、悔悟的同时，又向21世纪中国学界疾呼“魂”兮归来。魂即“学统”。

此书全部章节，曾以单篇论文在1997—2000年先后刊于《文艺争鸣》《北京文学》《当代作家评论》等杂志。此书由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9月初版，21世纪出版社（北京）2013年9月新版。2001—2002年在著者执教的华东师范大学作本科生“20世纪中国人文学思想史案研究”选修课教材，2010年至今在著者任“南山讲席教授”的中国美术学院作研究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专题”教材。

本卷附录此书初版序（徐葆耕）、《千禧夜答弟子问（代后记）》外，还有二文：《学术反思与文化“着陆”》（庞朴访谈录），原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刘锋杰《没有地址 抵达灵魂》，原载《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



目录

第一章 学统的分娩及其人格载体 / 谒梁启超书 1

若曰乾嘉学派为旗帜的清学传统是现代学统的最初受孕，那么，这学统胚胎是在先生的思想子宫发育得最好，而尊著《清代学术概论》则是其学理性分娩。

第二章 价值位移：从青年到晚年 / 谒王国维书 16

既然先生作为 20 世纪中国第一学人，年轻时便对学统有高度自觉，则何以在辛亥年后要毅然诀别自己曾倾心的文哲之学？何以至晚年（1923）会屈尊应召到紫禁城任废帝之“陪读”？又何以在北伐军威逼京城时（1927）拖着前清长辮而自尽深渊？

第三章 用生命践履碑铭 / 谒陈寅恪书 39

先生碑文倡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实是将乾嘉学风所孕育、后经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之思辨洗炼过的现代学统，提纯为简约明澈之“八字方针”，当更见学统的文化含量之凝重且幽邃。其间，“独立精神”为学统之魂，“自由思想”为学统之骨，风骨清傲，魂灵才得以发扬。

第四章 人海沉浮非书生所宜 / 谒吴宓书 57

当先生欲积极入世，以图事功，此即接近中古道统；当先生

欲寄情艺文，怡然著述，这又近乎现代学统。一马道统，一马学统，就平素理智而言，先生欲“二马比肩同进”；但就深层情怀而言，则先生更“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已任者”。

第五章 启蒙巨匠与“上卷先生” / 谒胡适书 75

先生本无意于成为学有专长的纯粹学人。“学人”这顶帽子，在先生眼中，未免尺寸太小，搁在头上，当不过瘾。后辈以为先生最适合戴“启蒙巨匠”这顶帽子。

第六章 生于斯死于斯的史家悲剧 / 谒吴晗书 121

后辈看先生的人格特征有二：一是书生当官；二是当官犹存书生气。本来，书生与官吏是两种行当，亟需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但先生却试着合二而一，“两栖类”，亦政亦学，亦官亦文，着意在一统体制内持有某种程度的独立，这是先生人格之可贵处，也是日后不免碰壁的麻烦处。

第七章 史诗之烈 诗史之哀 / 谒闻一多书 151

先生之生生死死所以耐人寻味，实在是先生之人格构成太博大，太独特；不仅涉及革命史，更涉及学术史、诗歌史；不仅享有哀荣，更发人哀思；斗士、学者、诗人这三重角色之间，不仅有朱自清所赞许的圆融近乎完美，也有因多重角色之各各衍生而不免生发的彼此抵牾或耗散。

第八章 世纪圣人的精神遗体 / 谒冯友兰书 195

先生作为中哲史界的“天下一人”，百年风云集一身，不仅生前曾大宠大辱转大悲大喜，且身后至今毁誉不一，当堪称世纪性的“冯友兰现象”的第一主角。好在先生晚晴率性，不惮将自己的思想及生平作“精神遗体”，让后世去解剖。于

是，这叠谒书也就成了后辈对“精神遗体”的一份慎重而系统的解剖报告。

第九章 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 / 谒王瑶书 249

自1969年陈寅恪含悲倒下后整整20年间，国内学界几无一人能像先生那样深挚地眷恋且追认清华对百年中国学术的历史性地位与影响，且在晚年主持《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所列20位重要学人中，竟有8位涉及清华背景，这便使历经风雨的“清华薪火”在百年明灭、几剩奄奄一息之世纪末，有幸系先生之余年而得复燃矣。

附录

初版序言	徐葆耕	323
千禧夜答弟子问(代初版后记)	夏中义 蕴梅	325
学术反思与文化“着陆”	庞朴 夏中义	339
没有地址 抵达灵魂	刘锋杰	346

第一章 学统的分娩及其人格载体/谒梁启超书

梁启超先生：

这是一封无法投递的信。所以执意书呈先生，实是因为拜读了尊著《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于吾心有憾憾焉”，才突发奢望，若先生真能不吝赐教，后辈三生有幸。

说实话，未读尊著时，后辈对先生是敬而远之的。先生为我国晚近史上的一代骄子，我一介书生而已，当“敬”无疑；但又“远之”，因先生首先是搞宣传的（袭用李泽厚的说法），是以擅长鼓动而炳彪史册的政治活动家，一俟涉足学术便不免疏阔（据说朱维铮校勘尊著时纠错达百余处），于是明知先生有此力作也懒得去翻。直到近年因痛感国中历来有政统、道统，独缺人文学者赖以安身立命之学统，进而臆测曾为学界所不屑的乾嘉学派倒可能孕有现代学统之胚胎，由此再觅新近重版之尊著，谁知一卷在握，竟读得如醉甘霖，夜不能寐。



梁启超(1873—1929)

后辈读出先生之本义，是要通过论述清代学术来弘扬“我国民确

富有‘学问的本能’”，“即一代而已见其概”^①。但窃以为尊著的分量恐远不囿于此；后辈的看法是，若曰乾嘉学派为旗帜的清学传统是现代学统的最初受孕，那么，这学统胚胎是在先生的思想子宫发育得最好，而尊著则是其学理性分娩。这就是说，尊著在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实绩，不仅在于高举了乾嘉学派的科学研究精神，更在于先生对此精神的那份价值自觉与独特思考，足使后辈能用这些思想资源聚合出某个多层次构成的、堪称“现代学统”的整体框架。

现代学统在尊著中似可分“学术本位”、“思想独立”、“科学归纳”、“朴学文体”四个层次，又相辅相成。先看“学术本位”。这是学统之魂，也是迥异于历代儒生“经世致用”之道统的原则界限，用先生的话说，即“凡真学者之态度，皆当为学问而治学问”，面对学术，“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不必问有用与无用”，因为“为用不为用，在乎其人也。……同是一学，在某时某地某人治之为极无用者，易时易地易人治之，可变为极有用”^②。故凡真学者总能从自己的学识才情、文牍著述中找到人生欣慰，而无须急吼吼地跻身朝廷，似乎只有戴乌纱帽才得安寝。章学诚说得好：“学术与一时风气不必求适合”，“学贵自成一家，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为愧”^③。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只须此桥委实契合我的气质、才华、良知和信念，能为自我实现提供最佳机遇，即使世间皆曰学人无足观，亦无碍我当“书呆子”——先生说对了：“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学问“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④，“非如此则学问不能独立，不能发达”^⑤。由此联想到近年大陆学界的“学术规范”讨论，心想“学术规范”似可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96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③ 同上书，第62—63页。

④ 同上书，第90页。

⑤ 同上书，第45页。

分“价值观念”与“操作细则”两个层面的，若称后者是技术性或工艺性规范，则先生所标举的“为学问而治学问”之价值观当为本原性规范或“元学术规范”。这就是说，若当下学人真能像先生那样敬畏“学术本位”，则其在“操作细则”层面迟早也会循规蹈矩的。

再看“思想独立”。这是学统之本，“学术本位”正是靠“思想独立”才兑现的。“思想独立”是为了“贵创”^①，欲“贵创”，非“空诸依傍”不可^②。何谓“依傍”？著书“全在模仿”，“逼肖古人”是也^③。先生所以尊顾炎武为清学之祖，首先是珍视“凡炎武著书，而决其无一语蹈袭古人”^④。也正是在这意义上，先生称阎若璩伟大，因他曾撰《尚书古文疏证》一书。此书是以专辨东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孔安国《尚书传》为伪书而著称于史。“夫辨十数篇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故自汉武帝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若对于经文之一字一句稍涉疑议，便自觉陷于‘非圣无法’，蹙然不自安于其良心，非特畏法网、惮清议而已。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摇动矣！今不唯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盖自兹以往，而一切经文，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再进一步，而一切经义，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以旧学家眼光观之，直可指为人心世道之忧”；“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⑤。先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1页。

② 同上书，第33页。

③ 同上书，第12页。

④ 同上书，第12页。

⑤ 同上书，第14页。

生在这里说得多么好呀！它何止“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①，分明是慧眼如炬，一瞥洞明古今。恕后辈浅薄，以前只知“思想解放”是新时期才幸逢的当代景观，却不懂清学兴盛之前提，乃在将学术从对封建戒律的“依傍”中“解放”出来，而今看来，天下学术，古今一律。再循此眼光去读尊著，也就豁然开窍先生为何如此推崇戴震，竟赞其“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部”？因为“盖无论何人之言”，戴震“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否则，“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②。进而也就明白先生为何如此神往“思想自由”，又为何如此厌恶康有为的“保教”丑剧？因为“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学新理而缘附之，曰：某某孔子所已知也，某某孔子所曾言也。……然则非以此新学新理厘然有当于吾心而从之也，不过以其暗合孔子而从之耳。是所爱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万一遍索诸四书六经而终无可比附者，则将明知为真理而亦不敢从矣。万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剔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弃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终不能饬遗我国民也”^③。说白了，“保教”也罢，“依傍”也罢，皆是身着古装的“凡是派”或原教旨主义者，貌似信念坚定，实为思维惰性乃至僵化如朽木不可雕也。

三看“科学归纳”。这是学统之技，别小觑这思辨性工艺，学术研究能否真正历经推敲，自圆其说，全赖此“精良之研究法”，先生甚至命之为“欲一种学术之发达”的“第一要件”^④。戴震曾云：“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⑤假如说，独立思考，空所依傍，是破“人蔽”之法宝；那么，攻克“自蔽”之良方，便是“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了^⑥。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7页。

② 同上书，第31—32页。

③ 同上书，第78—79页。

④ 同上书，第26—27页。

⑤ 同上书，第32页。

⑥ 同上书，第56页。

正因为先生视归纳法为纯粹科学精神之化身，故也就不难理解先生为何竟断言“清代学派之运动，乃‘研究法的运动’”^①，且理解先生又为何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细，不厌其烦地复述乾嘉学派的思维运演程序——我揣摩先生的初衷，大概是期待读者能像先生那样设身处地地去体悟治学之甘苦吧。试想戴震为了寻觅科学的“十分之见，必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②——从“未至十分之见”到“十分之见”，从科学假说到科学定理，其间步骤竟精微曲折如此，再“试思每一步骤进行中，所需资料几何，精力几何，非用极绵密之札记安能致者”^③？这当亟需学人全身心投入乃至支付终生的。无怪戴震感慨“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④。难就难在：若无献身精神，势必无计攀此境界。这就不仅仅是思辨技巧问题，而已分明转为一个学人的生存方式命题了。

末了是“朴学文体”。这是学统之相，人文学术成果之品位、分量或魅力，最终得借文体来凝聚且呈示。先生发现清学流行札记体，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所以被誉为训诂学之名著，“苟一察其内容，即可知其其实先有数千条之札记，后乃组织而成书”^⑤，原来名著之精义早就蕴结在诸多札记条款中了，而此札记又往往是作者的心得别裁，极可贵且难得，以致顾炎武撰《日知录》时叹喟，真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39页。

② 同上书，第32—33页。

③ 同上书，第56—57页。

④ 同上书，第34页。

⑤ 同上书，第56—57页。

正精到之札记“一年仅能得十余条”^①。何以精炼稀贵如此？究其因，无非作者“恒不欲有一字余己所心得之外”^②。尼采说他爱读用血写的

的书，清学札记委实不乏近之者。也正因为清儒治学自律甚严近苛，他们也就“最戒轻率著书”，因著书“其范围必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③。清学之文体包装竟大多质朴如此，故谓“朴学”。先生这一点拨实令我感激。感激之一，是我觅得史鉴一帧，映出当下“文抄公”以炮制成堆的印刷垃圾来沽名渔禄，与先哲相比，真不啻为天壤之别。感激之二，是我由此始悟钱钟书《管锥编》之文体大概可追溯到清学，这似又可说明两点：一是先生曾叹息清学札记那般“绵密深入而有创获者”之文体“今亡矣”^④，现已起死还魂，有钱著为证；二是不论钱著文体之海涵如何浩瀚、繁富与深邃，就系统思辨程度而言，它仍属半成品，虽堪称“伟大的半成品”。

从“学术本位”、“思想独立”、“科学归纳”到“朴学文体”，依次相衔而成“现代学



梁启超手迹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7页。

② 同上书，第56页。

③ 同上书，第56页。

④ 同上书，第58页。

统”整体。后辈称“学统”为“现代”，不仅指其学理资源是先生在本世纪初贡献的（尊著脱稿于1920年），更是指“学统”所以为“学统”，它定然异质于儒生道统，即在价值上别有所系，它似对近代人文背景更具亲和力，这相对于道统之古典性而言，堪称“现代”。想必先生对此会首肯吧。另须对先生交代的还有，将尊著的第一业绩定为对“现代学统”的学理性分娩，并把先生的有关思索梳成“现代学统”这一整体架构，确是后辈从尊著中读出来的，先生虽不曾这么直白，但我还得说，思想资源乃至相应的关键词几乎全取自尊著，我的作用不过是悟出了先生话语之间的隐性关联，从而将散布在尊著诸章节中的有关谈片重铸成文。我是迟到的裁缝，着意将先生留下的裁片拼缝成衣，至于针脚是否熨帖，当恳请先生甄别且教诲。

先生，后辈体会尊著在论及学统与学者人格的关系时亦别出心裁，别有洞天。要点有三。

一、学者作为学统的人格载体，当不止是外部角色符号，相反，学者真的敬学术为人生本位，则学术对学者而言，便意味着是其生存方式或价值根基，须“治一业终身以之”^①。亦即他不再像历代儒生矢志“内圣外王”，期盼自己有朝一日为“帝王师”或为宦助君治国平天下（甚至身在江湖亦心忧魏阙）；不，学者应心平气和地活在另一时空，遗世而不忘世，虽“不周于世用”^②，涉足国计民生，但又自信如清代天文学鼻祖梅文鼎：“吾为此学”，“唯求此理大显，绝学不致无传，则死且不憾”^③。

二、真学者所以能倾心学术乃至以身殉业，当是在儒生道统外悟出了另一准则，即人生价值之衡定，无须仰赖现行政治等级框架来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5页。

② 同上书，第96页。

③ 同上书，第22页。

测量。这就是说，人的角色选择之幅度实不囿于“读书做官”一途，将“学而优则仕”奉为无上尺度，恐为道统之近视，是历代儒生在自我设计时过分“突出政治”所致。若换一视角，以“平常心”来公正比较人生抉择，则治学与从政本各有所长与所短，亦即当政治可能因直接影响现实进程而轻侮学术的不胜世务时，学术也不难挑剔政治往往多因时制宜，因势变异，而使其如舞榭歌台，轮回风雨，悲喜不堪，犹不及纯学术之世代传承，为旷世恒言。

三、这就从骨子里决定了学者的人格风范（作为学统的血肉载体），理应迥异于浮沉仕途的宦宦脸谱，因他远离功名利禄，“与世无竞”，“唯日夕闭户亲书卷，得间与同气相过从，则互出所学相质”^①，也就可能活得较自在且磊落，既无须逢迎一唱百诺，亦不必因过于设防而将自己谦抑得没了性情本色。故先生称清代“兹学盛时，凡名家者，多耿介恬退之士”，他们“素惯淡泊”^②，“非特学识渊粹卓绝，即行谊亦至狷洁”^③；且“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④；“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而“所见不合，则相辨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不以为忤”，学理面前人人平等；而辨诘当对学不对人，“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云^⑤——所有这些，我是极愿相信且恨吾生也晚。我体悟先生的精义是，若学人皆以学统自律，则这不仅“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欺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⑥——更要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9页。

② 同上书，第6—7页。

③ 同上书，第5页。

④ 同上书，第44页。

⑤ 同上书，第45页。

⑥ 同上书，第96页。

紧处乃在,学术有此“学者的人格”垫底,则中国甚至世界学术“文化之进展”有望矣。

这是否说,学术发达之根子仅取决于学者人格?先生当无此意。后辈发觉先生虽非自觉的唯物史观论者,但亦看重社会环境对学术的影响,且屡屡将此话题置于世界背景来作中西文化之平行比较,认定清学所以繁荣百年,气象非凡,是与清廷在乾嘉年间曾“以右文之主自命”,开馆修书,大臣养士,“隐然兹学之护法神”,乃至盐商亦附风雅,“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名士等诸多外因分不开的——这恰巧跟罗马教皇、王室家族、名门富豪曾先后以不同方式赞助、奖掖意大利人文学术暨艺术,酿成名垂史册的“文艺复兴”运动,交辉相映,互为印证^①。“吾常言:欲一国文化进展,必也社会对于学者有相当之敬礼,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而能有余裕以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日新焉。”^②先生高见诚与马克思关于人首先得吃饭、然后创造历史之原理相通,但我却从中更多地读出了先生对中国学术前景的一往情深与真诚祈愿。

所以如此解读尊著,可能与后辈对学统的理解有关。简言之,后辈以为学者若真将学术当人生的第一需求来追求,则与其让自己对驾驭不住的世界满怀戈多式的期待,倒不如让自己学一点桑提亚哥式的价值自律,因为希冀社会是铺满玫瑰的舞台,就等你去表演,这近似奢念。历代儒生的命运悲剧,其实正在于一味神往“内圣外王”,却大多不懂“内圣”并不必然地导致“外王”,亦即“内圣”者能否兑现“外王”梦之关键,并不取决于儒生的主观动机及践履,却往往取决于历史偶然,这便充满随机性。这就酷似梦想走红的梨园新秀,光有演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60页。

② 同上书,第59页。